

琼崖抗日根据地——

天涯孤岛上的抗战星火

■周 一

人们耳熟能详的“琼崖”，是海南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称。从地理位置上看，琼崖位于祖国南部，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西、南、东三面环海，与越南、菲律宾等国隔海相望。从战略地位而言，琼崖是海上出入广东、广西的咽喉，自古以来便是南海地区的交通要冲，更是我国南部的海疆要塞，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在特殊的地理与战略环境下，琼崖地区孕育了一支发展脉络独特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这是华南地区唯一一支党领导的从红军时期延续下来的抗日武装，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琼崖红军游击队。1932年琼崖地区反“围剿”失败后，这支部队一度锐减至几十人。历经艰难重建，至抗战全面爆发时，琼崖党员数量约600人，红军游击队仅200人左右，力量十分薄弱。但长期革命战争积累的战斗经验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成为党在琼崖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的有利条件，也是人民武装能在这座孤岛上长期坚持斗争的重要保证。

未雨绸缪组建抗日武装

日本对海南岛覬覦已久，早在中日甲午海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将海南视为控制南太平洋的重要基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华东等广大地区，并不断调遣兵力，准备向华南和东南亚一带发起新攻势。在研究进攻广州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大本营海军省强烈要求攻占琼崖，将其作为“进窥华南，控制太平洋”“囊括东南亚”的战略基地。

中共中央、中共琼崖特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侵略早有预料，但受限于武装力量薄弱和岛内复杂形势，未能在较大范围内发动群众开展防御部署。1937年年中，为打开琼崖抗战局面，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公开发表《团结抗日，保卫琼崖》告同胞书，同时主动致信国民党琼崖当局，表明抗日立场，希望双方以民族利益为重，尽快启动部队改编谈判、开展合作，共同做好抵御日军侵略的准备。然而，这一正确主张非但未获国民党方面认可，对方反而借谈判之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甚至逮捕了琼崖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冯白驹，致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1938年9月底，日军将进攻矛头直指琼崖，不仅频繁轰炸海口、府城等重要城镇，还派出海军窜犯岛南榆林港，为登陆作战进行准备。危急之下，中共琼崖特委从大局出发，主动做出让步，最终与国民党当局就红军改编后的番号、编制、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场景图。资料照片

军需、指挥权限等问题达成一致，初步建立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集中在琼山县云龙墟举行改编暨誓师抗日大会，部队正式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下辖3个中队，队员300余人，冯白驹担任队长。此次改编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琼崖的胜利，为整合抗日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开辟和巩固琼崖抗日根据地奠定重要基础，也极大鼓舞当地群众的抗日信心。

主动阻敌开辟新根据地

1939年2月10日，经过长期军事策划的日军在海口西北角的琼山县附近登陆。负责沿海防御的国民党部队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日军很快相继攻克海口、府城、澄迈、临高等地，并逐步向岛内纵深推进，大有鲸吞全岛之势。

独立队闻讯后，迅速派人前往琼崖守备司令部，提议与国民党部队联合抗敌，然而当我方人员抵达时，发现国民党军政机关早已撤离。队长冯白驹等人紧急分析形势，认为必须立即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此迟滞敌军的进攻步伐，为城内群众转移争取宝贵时间。经过简短研究，独立队最终定下在潭口渡口东岸阻击敌人的作战决心。

潭口渡口地处南渡江下游，是海口至文昌公路的重要交通节点，距离独立队主要驻地云龙墟仅十几公里，更是日军东进的必经之路。此时日军刚登岛不久，势头正盛，独立队抓住敌人分兵冒进的弱点，依托东岸有利地形迅速构筑工事，准备打一场出其不意的伏击战。就在独立队第一中队进入阵地后不久，日军大部队开始渡江。第一中队的指战员沉着应战，顽强阻击东渡的敌人。从海口、府城逃出的群众原本躲藏在公路

两侧，听到枪声后，迅速撤至我军纵深地带，并在独立队引导下有序疏散，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

潭口阻击战的消息很快传遍琼岛，群众对独立队敢打敢拼、舍身保护群众的行为大加赞赏，纷纷捐钱捐物支援抗战，不少青壮年更是主动要求报名参加，与独立队并肩作战。随着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独立队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开展游击作战，频繁袭击日军车队、据点和仓库等目标，使得日军不敢轻易出动，更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扫荡”行动。

1940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要将琼岛打造为“党在南方发展扩大影响的根据地”。琼崖特委随即决定抽调部分力量向岛内腹地转移，并在澄迈、临高、琼山三县交界处的美合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前期充分的动员工作，部队刚抵达美合地区，当地党组织便发动群众组建了“农救会”“青抗会”“妇救会”等民众团体，全力配合根据地建立与巩固。此后，党领导人民群众以岛内各小块抗日根据地为基础，不断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范围，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岛，为坚持长期抗战、扭转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争取外援扩大抗战力量

琼崖四面环海，与东南亚各国交流往来频繁，旅居海外的琼侨数量众多。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却始终心系岛内局势，竭尽所能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既是琼崖军民开展抗日斗争的鲜明特点，更是支撑抗战的独特优势。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旧址凉亭。送驾岭地区掩护战斗资料照片

第3团进至洪家坂，分兵占领南北两侧山头，部分兵力沿浪川洞正面推进。

先遣队后卫部队依托各处险要地形与山坡工事，以密集火力顽强阻击。在鲍家村东侧阵地打退敌补充第1旅正面进攻后，敌军转而以主力向钓金山方向迂回。红军迅速调整部署，利用山林沟壑的天然屏障与敌军展开拉锯战。战至黄昏，敌始终未能突破防线，进攻乏力。

夜幕降临，先遣队主力已撤上大连岭，随即命令后卫部队有序撤退，并指派侦察连负责断后。侦察连转移至送驾岭顶西端的凉亭时，见横路和钓金山方向暂无敌人，便占领凉亭西侧的小高地，还派出1个班提前赶到横路东端的岭顶，把一面红旗插在凉亭上，全班则隐藏在岭顶突出的山梁后面。

敌第289团发现红旗后，误以为红军要在这里死守不退，当即命令所属2营逼近送驾岭附近的山地，隔着深沟向凉亭方向射击。此时，敌补充第1旅第2团也已占领钓金山东侧的山地，听到送

1938年广州沦陷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积极行动，发起并组织召开海外琼侨代表大会，共商救国救琼的具体事宜。在这次会议上，各国琼侨领袖态度坚决、热情高涨，纷纷号召广大琼侨团结一心支援家乡抗战。会议最终决定成立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并组建回乡服务团，分批返回琼岛直接参与抗日斗争。

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央指示，采取多种措施主动加强与海外琼侨的联系，以争取更多力量支援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斗争。1939年中期，琼崖特委专门派人前往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开展访问与募捐工作，并在湛江设立办事处，在香港派驻常驻代表，以此作为琼崖抗日根据地与外界联络的重要枢纽。琼崖抗日武装主要领导人冯白驹还在香港《工商日报》上发表文章，向广大琼侨介绍岛内党组织和抗日军队的情况，报告抗日作战的具体进展，以此增强琼侨的抗日信心，争取更多援助。

在琼崖特委的宣传动员与组织协调下，香港琼侨服务团于1939年4月起分批返回琼崖，直接投身岛内抗日斗争。在他们带动鼓舞下，东南亚各地琼侨社团纷纷响应，先后有240余名爱国青年回到家乡。这些归国琼侨有的深入村镇开展抗日宣传，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有的组建医疗队伍，为抗日军民提供战地医疗服务；有的直接加入抗日武装，在战场上奋勇杀敌，逐渐成为根据地内一支不可或缺的抗日民主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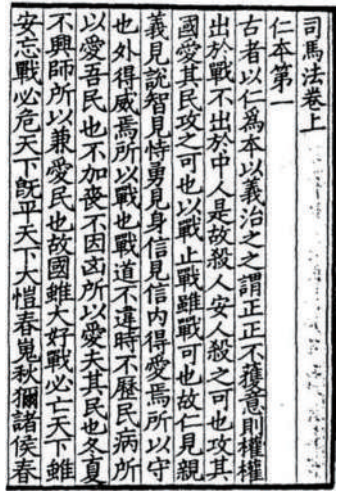
1941年冬，在琼崖特委领导下，由回乡服务团倡议发起，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根据地内首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在后续的抗日作战与反顽斗争中，它不仅承担起组织群众、支援前线的重要任务，还在巩固根据地、维护地方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琼崖抗战的坚持与推进提供坚实的支撑。

1944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琼崖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力量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这是党基于抗战即将胜利的形势，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1945年8月，琼崖纵队通过缴获的敌军文书，获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随即对日伪军实施反攻，迅速攻克并解放了100余处城镇和据点。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党领导琼崖军民累计与敌军作战2000余次，解放了全岛五分之三的地区，建立起1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为夺取抗战的彻底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开栏的话

泱泱华夏，兵学煌煌。数千年来，无数兵典在历史烽烟中淬炼而成，它们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更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斗争的勇气与善于斗争的谋略。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版特开设“中华兵典”专栏，为广大读者推介极具代表性的兵学著作，梳理其思想要义与精神特质，展现其历史贡献与现代价值，敬请关注。



在中国兵学谱系中，《司马法》占据着极为特殊的位置。它以“军礼”立身，留存商周遗制，倡行仁义先声，是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之一。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钦定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臣考试、将领选拔的必读之书。今本《司马法》存5篇，包括《仁本》《天子之义》《定霸》《严位》《用众》，内容涵盖战争伦理、治军原则、作战制度与军礼规范等诸多方面，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称其“闳阔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

《司马法》有着多方面的突出价值，它以“军礼”为底色，详细记述了出师礼仪、旌旗徽章、兵器规制、赏罚制度等内容，对“逐奔不过百步”“成列而鼓”等古军礼条规多有记录，为后世研究周代军礼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同时，它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固”的战争伦理，首篇《仁本》开宗明义，强调战争发起要遵循“以仁为本”的原则，这种主张深受西周“礼乐”文明影响，凸显了战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书中并不回避战争，而是积极倡导“以战止战”，认为战争的目的并非杀戮征服，而是“安人”“爱民”，力求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和平目标。此外，《司马法》还提出依法治军与居安思危的军事理念，明确主张“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强调军队治理与社会管理必须划定严格界限，治军当以法令为准绳，确保上下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在战略战术思想上，《司马法》也有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定霸》篇将战争的基本特征归结为斗智斗勇，提醒指挥员要全面权衡利益得失，依据自身能力与目标需求灵活制定作战策略；《用众》篇着重强调指挥员必须精通“众寡之

《司马法》： 以仁止戈，以礼固兵

■熊剑平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这句穿越千年的箴言，早已被历史反复验证。从穷兵黩武最终覆亡的王朝，到因放松警惕而陷入危机的政权，无数前车之鉴都在印证着其中的深刻智慧。近代中国因国力孱弱、武备废弛而遭受的百年屈辱，更是让我们对“忘战必危”有了切肤之痛。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我们更应铭记这一古训：唯有摒弃好战的狂妄，同时筑牢国防的根基，以强大的实力守护和平底线，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捍卫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宁，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中华兵典

一盏油灯照亮游击岁月

■朱素群 刘 思

在江西省遂川县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盏单柄铁煤油灯。它曾是碧洲红军游击队的重要照明用具，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陪伴队员们熬过无数漫漫长夜，见证了游击队员们的顽强抗争，镌刻着遂川群众与红军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

1934年8月，红6军团从遂川横石等地突围西征，承担起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先遣任务。主力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对湘赣苏区留守红军和当地群众发动残酷“清剿”。1935年春间，留守在遂川、万安、泰和地区的湘赣省保卫局第2中队70余人，在与上级失联、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转移至遂川碧洲山区，搭建杉皮棚栖身，以原中队为基础组建起碧洲红军游击队，开启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艰难，远超想象。1935年冬，敌人实施大规模搜山“清剿”，将山里群众强行驱至山下据点。游击队员被困深山，有时数月得不到一粒粮食、一点食盐，只能以野菜、野果、竹笋充饥。饥饿、疾病与寒冷夺走不少队员的生命。

游击队深知群众是最坚实的后盾，遂先派出队员下山联络党组织和群众，再通过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清剿”斗争。迫于群众压力，国民党碧洲乡政府被迫同意群众回山种地，游击队借此获得接触群众、获取补给的机会。很快，碧洲一珠湖一长山子的秘密交通联络线建立起来，当地群众用生命架起“连心桥”，以各种方式默默支援着这支红色队伍。

共产党员傅忠诚、傅忠怀兄弟，是群众支援游击队的典型代表。傅忠诚借债在碧洲街开设杂货店，表面售卖日用品，实则作为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站。傅忠怀则利用保长身份作掩护，在敌人眼皮底下巧妙周旋。他一边应付国民

党的“清剿”指令，一边暗中传递关键情报。一次，敌人计划清晨突袭游击队驻地。傅忠怀得知消息后，连夜派人冒雨上山送信，让队员们及时转移，从而粉碎了敌人“围剿”计划。像傅氏兄弟这样的群众还有很多，有人悄悄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有人种地时在隐蔽处留饭菜，收割时特意在地里留稻穗……

这盏陈列在博物馆的油灯，正是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封锁线送上山的。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煤油堪称稀缺品，它不仅照亮了游击队员夜晚议事、学习的杉皮棚，更承载着群众对红军的牵挂与希望，成为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见证。

1937年冬，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主任韦瑞珍奉命前往湘赣边游击区，寻找分散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历经艰险，他最终在碧洲找到与上级长期失联的碧洲红军游击队。1938年3月，在群众夹道欢送下，游击队整装下山，编入新四军军部通讯连，奔赴抗日前线。临行前，队员们将这盏油灯留给当地群众珍藏，铭记那段共患难的艰苦岁月。



碧洲红军游击队用过的单柄铁煤油灯。江西省遂川县博物馆供图